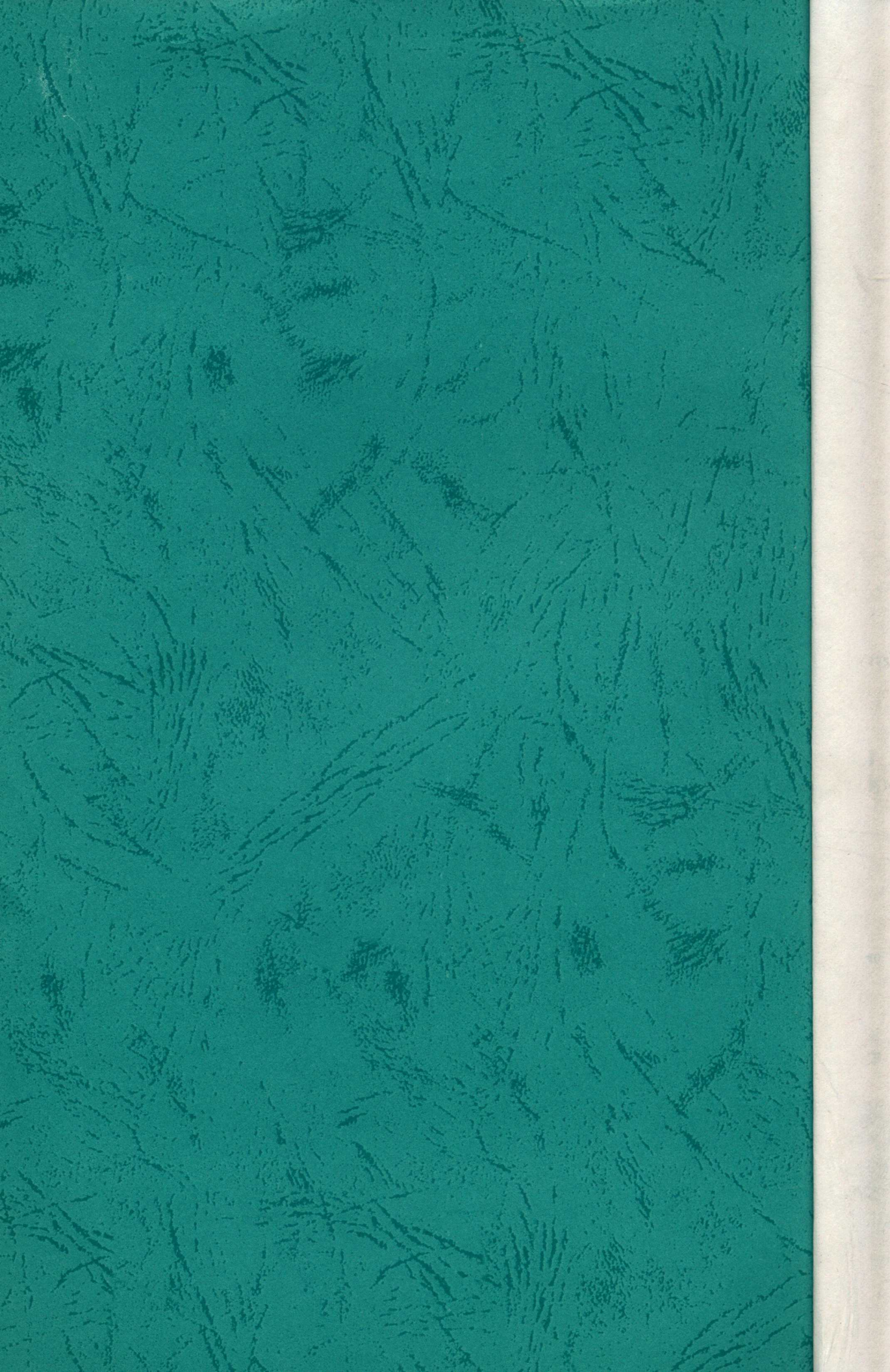


赛珍珠研究资料

2000年

宿州师专图书馆



目 录

- | | |
|---------------------------|-----------------------|
| 1、赛珍珠和林语堂 | 张德文 |
| 2、赛珍珠与中英小说比较研究 | |
| —— 评《东方、西方及其小说》 | 姚君伟 |
| 3、师大学报与“赛珍珠研究” | 郭英剑 |
| 4、赛珍珠家庭题材小说论 | 徐 清 |
| 5、东方、西方及其小说 | [美] 赛珍珠 著 张丹丽 译 姚君伟 校 |
| 6、“异乡人”身份和“边缘人”人格的赛珍珠 | 仲 鑫 |
| 7、我欠狄更斯一笔债 | [美] 赛珍珠 著 张志强 译 |
| 8、再论赛珍珠与中国文化 | 周锡山 |
| 9、论《旧与新》中的中西文化冲突 | 姚君伟 |
| 10、赛珍珠与《大地》中的土地情结 | 吴松江 |
| 11、赛珍珠小说与 30 年代中国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 徐 清 |
| 12、寻求女性个体生命的意义 | |
| ——论赛珍珠的《群芳亭》 | 郭英剑 于艳平 |
| 13、赛珍珠《东风·西风》中“儿子”形象的寓意 | 周卫京 |
| 14、赛珍珠的中国小说观 | 王玉括 |
| 15、寻根王虎 | |
| ——赛珍珠小说男性形象系列分析之一 | 杜 林 |

赛珍珠和林语堂

张德文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是美国著名女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幼年即随父母远涉重洋到东方陌生的国度——中国,先后在上海、镇江、宿州、南京等地整整生活了40年。她的经历独特,一方面是多才多艺的母亲为她提供的西方教育,另一方面又有保姆王妈的中国民间故事熏陶和家庭教师孔秀才的儒家传统教育,从小在两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她在自传中描述她的成长背景:“……我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个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我就关上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①在“中国人世界”里,她接触到大量的中国下层人民,包括农民、丫鬟、厨师、洗衣妇等等。她初期的小说创作即以这些中国下层人民为主要题材,并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真切而取材丰富……”^②而获得瑞典皇家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返美后始终惦记着养育她的东方国度,她的一生都与中国紧密相联,中国是她生命中永远的怀念,她自谓“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祖国”。^③

赛珍珠在中国从事小说创作的年代,即1920年代至1935年,在中国的文坛上也活

跃着一批相当有份量的人物,像鲁迅、徐志摩、郁达夫、林语堂等人。林语堂是留美、留德的“双料”博士。早年在著名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他的英文功底相当深厚,曾编著《开明英文读本》,是30年代上海滩上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在文学上,他首次将西方“Humor”一词译成中文“幽默”,并以提倡性灵、闲适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又因为他避开了三十年代初以来的进步文学而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

1930年和1931年赛珍珠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东风·西风》和《大地》,尤以后者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赛珍珠由此声名大振。她的作品很快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文坛更是引人注目。但是由于赛珍珠的创作与当时中国文坛的显著差异,即她以中国下层为主要描写对象,她的创作争议较大,有些沉湎于中国文化的“留洋博士”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污蔑赛珍珠的作品歪曲中国的事实,说赛珍珠没有描绘真实的以士人为主体的中国。而有些倾向进步的作家则因赛珍珠的作品没有反映当时中国各阶级的激烈矛盾,而否定其作品的价值。鲁迅针对赛珍珠的作品《大地》,也曾发表异议,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应该由中国作家来演绎才能显其真实之处。^④

①③ 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第5页。

② 刘龙、王玉国编著:《赛珍珠》,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04页。

④ 《鲁迅全集》第12卷,第273页。

赛珍珠“发自内心”的企盼

赛珍珠的父母是虔诚、正直的传教士,将传教视为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他们带着孩子居住在百姓中间,而不是在教会专为传教士修建的花园洋房里,因而赛珍珠的青少年时期主要生活在中国下层的环境氛围中,后来这些经历便成了她笔下的世界。她富有同情和博爱的描述一扫过去欧美某些记者、作家对中国猎奇式的片面记载,向西方展示了一个客观的中国农村世界。在她的作品里,中国江南、江北农村的洪水、旱灾、瘟疫、饥饿、战乱、军阀、土匪无时不在威胁着一个古老国度里的人们,而他们的生命力仍是那么旺盛,一有机会就生儿育女,牢牢地嵌在土地上,只要有土地,他们就能活下来。时值日本加强对中国的侵略,赛珍珠对中国的描写符合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欲望。她的作品不仅因本身的质量也因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受到极大的欢迎。赛珍珠从自己著作销售后的强烈反馈信息中敏感地捕捉到西方读者的心理,中国是神秘而多彩的国度,百年饱受屈辱,近年战争威胁笼罩,究竟它的庐山真面目又如何?对西方读者而言,最好的认识方式,不再是西方的作家匆匆在中国走一遭,然后以他们的浮光掠影式的游记充当媒介向他们介绍中国,而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向他们讲述一个真正的中国。

读者需要,赛珍珠同样需要这样一位作家,不仅仅是因为她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她从中国国内的文艺批评中也感受到这种需要,即无论她是怀着如何同情的理念去讲述中国百姓的普通故事,她终究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她的描述无法阐明一个文化中国。她需要一位中国的学者式文化人,和她一起,向西方讲述多层面的中国,以揭开几百年来罩住中国的或歪曲或神秘的面纱。她“发自内心”企盼有中国的作家出来挑此重任。

赛珍珠的心中有这样一个企盼,也有一

个具体的计划,然而谁合适担纲这一重任呢?这个人不但应深谙英文,可以用英文写作,而且在赛珍珠看来,“他应有聪明的智慧,深刻的洞察力,在这混乱的时代并没有迷失方向”,^①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胜任这一工作。因为中国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的幽默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生活,这是多少代人用世故和学问培养出来的幽默。他们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他们能够明智地选择他们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赛珍珠对中国有很透彻的理解,深知中国有它强烈的个性,中国的个性绝不是锋芒毕露的,它包含在那严格有秩的礼仪中,隐含在人们敦厚的语言和面容里。……,当时的时局绝不能代表“中国”这两个字的内涵,这种内涵却需要敏锐的智慧才足以反映它。赛珍珠是一个高明的觅才者,她一遍又一遍地打开中国人的著作,然而又一次次地失望地合上,她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觅得这位合适的人选呢?

偌大中国,毕竟大有人才,一个名字引起了赛珍珠的注意,那就是林语堂。

1933年,林语堂在《论语》上大力提倡幽默,这一年围绕幽默,在文坛上展开争论,由此被命名为“幽默年”,林语堂当之无愧地也被称为“幽默大师”。赛珍珠经常在《中国评论》(China Critic)看到林语堂的文章,不禁被他“辛辣的笑语和尖锐的讽刺”^②所吸引。林语堂对时局批评的坦率态度和富含机智幽默的语言也使赛珍珠对林语堂产生极大兴趣。赛珍珠凭着她对中国人的了解,隐约地感觉到林语堂就是她所企盼的人。然而林语堂自幼接受严格的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对国学的造诣较弱,他的论敌因此批评他尽管睿智幽默,但不渊博。^③赛珍珠正在犹豫不决之

① 赛珍珠:《中国人·序》,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②③ 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时,一张由《中国评论》周报发来的请柬为她提供了与林语堂见面的机会。

《中国评论》周报邀请主要的撰稿人聚会,包括胡适、林语堂等在内。席间,赛珍珠十分谦让,没有多言。她坐在那儿静听中国当代这群精英的谈笑风生,他们的如珠妙语和深邃思想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名声鹊起的女作家。林语堂通晓外文,对赛珍珠的了解也较多,后来他们便攀谈起来。赛、林两人均是沐浴于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有共同的乡村生活经历,且有同情的人性之心,他们的话语相当投机,好客的林语堂向女作家发出邀请,要她去做客,“见见我的夫人”。^①

林语堂“怀抱真诚”的应邀

赛珍珠欣然应约前往林语堂在上海相当漂亮整齐的家。林夫人廖翠凤是厦门的富家千金,早年曾跟随丈夫伴学欧美,性格爽朗、大方,林夫人是赛珍珠在中国认识的另一种女性,受过西风的沐浴又兼具中华妇女传统的“贤妻良母”品德。他们的晚餐在愉悦的气氛中进行,林家女儿们的活泼聪明为他们带来了不少笑声。饭后,林语堂和赛珍珠在书房继续交谈。

他们的话题自然地就引到由赛珍珠翻译成英文的小说《水浒传》,赛珍珠将书名意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林语堂认为赛珍珠译得非常好,他认为“All men are Brothers”准确地传达了《水浒》所要表达的精神,这对一位外国人来讲是相当了不起的译作。由此他们又谈论起以中国为题材写作的外国作家们。由于当时大部分外国作家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不长,走马观花,未能深入了解,且大多带有因袭的偏见,因而对中国的描绘多有歪曲。例如当时一家《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的英文刊物,专门以中国有别于西方的习俗作为嘲笑的对象,使中国在英语国家里留下野蛮、粗俗的印象。针对这种事实,赛珍珠和林语堂两人都深感忧虑,林

语堂面对这位视中国如自己家园的女作家,坦诚地提出自己的计划,说他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林语堂的打算与赛珍珠的想法不谋而合,赛珍珠热情地鼓励他用英文进行创作,她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已经注意到了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小评论,^②初步认定了这个人的,而与林语堂的接触则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两人都兴奋异常,共同的话题,拉近了两者的距离。林语堂的无所畏惧和引人瞩目的才华使赛珍珠强烈地预感到林语堂的创作影响将不可限量。会面之后,她即刻写信给纽约的约翰·戴公司——赛珍珠的出版商所在的出版公司——要他们尽快关照当时尚不为西方所知的这位中国作家。

林语堂受约之后,加快构思创作,据他的女儿林太乙回忆,当时林语堂怀抱真诚的应邀全身心地进入写作状态,全家没有一个人敢去惊扰他。只有夫人廖翠凤碰到万分紧急的事而不得不与他商量的时候,才进到林语堂的书斋。父亲的“倾心”在女儿眼中变得“不可理解”,可见林语堂为此付出的巨大心力。^③经过十个月的努力,这本题为《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英文集子终于完成。

书稿很快寄往赛珍珠处,她不敢懈怠,立刻加以阅读。以她对中国的了解,认识到这是一本“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有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以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宝贵、最完备、最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④她着力推荐这本书给她的出版商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华尔许·沃尔什所在的约翰·戴公司出版,并亲自为该书作序。在当时的美国,赛珍珠是普利策奖的获得者,著名

① 施建伟:《林语堂》,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② 《林语堂文集》第8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页。

③ 施建伟前引书,第97页。

④ 赛珍珠:《中国人·序》,第8页。

的以中国为题材的畅销书作者,她的序言,是对林语堂著作的质量保证,也是无形之中最具吸引力的广告。

赛、林初次合作“旗开得胜”

林语堂结束《吾国吾民》的写作,从避暑胜地庐山踌躇满志地回到上海,不料上海却有一场针对他的文学批评正等着他。

林语堂从美学和趣味性的角度出发,在艺术上提倡性灵、幽默、闲适。而当时的国内社会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东三省沦陷、热河告急,左翼作家们认为林语堂的提倡弱化了斗争精神,在险恶的民族危机之时是不合时宜的。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中说:“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讲笑话’和‘讨便宜’。”^①林语堂在国内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掀起“批林”高峰,从1934年11月鲁迅作《骂杀和棒杀》批评林语堂始,到1935年,一发不可收拾,林语堂在国内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

正当林语堂在国内成为众矢之的之时,1935年底却从美国传来好消息,《吾国吾民》一书一炮打响,畅销美国,仅在9月至12月的4个月中,就印刷了7次,在当年就进入畅销书单之首,^②为林语堂带来一笔不小的版税的同时,更为赛珍珠丈夫沃尔什所在的出版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赛珍珠夫妇分别是热忱的“中国通”和有经验的出版商,认准了林语堂的文笔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遂盛情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写作。

林语堂权衡形势,终于下定决心,卖掉上海的房子,于1936年8月带领全家赴美。林语堂在美国的第一站是赛珍珠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青山农场,赛女士热情款待了远道赴约而来的林氏一家五口。初来乍到,林语堂计划将中国古典著作介绍给西方读者。赛珍珠的丈夫沃尔什从《吾国吾民》一书的销售情况认

为林语堂应趁热打铁。鉴于美国读者对《吾国吾民》最后一章《生活的艺术》的热情,沃尔什作为出版商从畅销书的角度建议林语堂改变原计划,另写一本反映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休闲的书。沃尔什是有经验的出版商,对读者和图书市场都有相当了解,他的建议最终被林语堂采纳。1937年7月,这本题为《生活的艺术》的书稿完成,面市后,果不出所料,风靡美国,比当年的《吾国吾民》更为受欢迎,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出现了“林语堂热”。《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达40版以上,并被译成十几种不同的文字,^③林语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迅速上升。“旗开得胜”的合作也加深了赛氏一家和林氏一家的友谊,“两家的孩子也成为好朋友”。^④

友谊的升华与破裂

赛珍珠和林语堂的合作使得林语堂成为备受西方瞩目的中国作家,他们的跨国友谊成为文坛的佳话。在他们的友谊与创作中,可以发现两者有相似的文化创作观。

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及其以中国为题材的大部分著作都与中国的农民、农妇、佣人等下层劳动人民为题材,她笔下的农民就是她看到的农民,她说:“走访农家成了我自己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在农民当中,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⑤在自传中,她真诚地回忆起家庭教师孔先生对她的影响:“孔先生给我的最主要的教诲是:一个人想过得愉快,他决不能高人一头。”“如是,小时候从孔先生那里我学到了初步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事出必有因……”她在这里表达了一种创作思想,即她的写作来自于普普通通的人民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哲理。无巧不成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也表达

① 《鲁迅全集》第5卷,第43页。

②③④ 施建伟前引书,第107页,第123页,第158页。

⑤ 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第8页。

了这一创作思想：“我的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①林语堂初至美国之后的创作思想与赛珍珠相当类似。赛珍珠以中国下层为主的小说创作在30年代受留美的中国学者江亢虎（音译）的批判，认为赛珍珠的小说创作脱离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对中国社会的歪曲。^②林语堂的创作思想表达无疑对这种批判是一个有力的否定。赛珍珠和林语堂都曾有乡村生活的经历，都在汉语、英语的双语环境中生活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类似的经历和创作思想为这段跨越文化的文坛佳话添砖加瓦。1938年，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即刻收到林语堂的贺电，对她表示真诚的祝贺。在中国的抗战中，赛珍珠在美国发起成立紧急援华委员会和联合援华会，林语堂作为中国人和赛珍珠的挚友，除了亲自回国外，他支持了赛珍珠在美的援华活动，既是对祖国一片赤子之心也是对赛珍珠的支持和感谢。1942年，著名的秘密党员谢和庚和王莹肩负周恩来的秘密使命抵达美国；当时的林语堂并不知道他俩的真实身份，他本着爱才之心，主动推荐他们与赛珍珠认识。赛珍珠为王莹的曲折经历和才华所倾倒，在林家，她为王莹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美国公众逐渐认识了王莹，一时间，王莹以“中国爱国女明星”，“中国的海伦赫斯”（海为当时美国著名演员）成为新闻人物，^③为日后在美宣传抗日活动打开了局面。王莹受到赛、林的支持在白宫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备受时人瞩目，宣传了中国的抗日。赛、林的合作支持，说明在40年代初，赛、林之间以中国为纽带的私人友谊仍然非常坚固。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友谊并没有长久地存在下去，一朵花在盛期就渐渐萎缩。

事因的表面是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后经济困难，向赛氏借钱未得，两人之间的友谊

逐渐冻结。

林语堂早有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设想，1947年，他终于发明一台中文打字机，每分钟可达50个汉字。1951年，美国麦根勒公司买下样机，但由于其成本大，造价高，未投入生产。林语堂为发明打字机，用去多年的积蓄10万美元。在困难的日子里，他想到了在美的友好赛珍珠，但是赛珍珠以美国的方式来看待借贷关系，对林语堂态度冷漠，受到打击的林语堂备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至于他说自己“看穿了一个美国人”^④。两人之间的友谊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1954年，林语堂准备出任南洋大学的校长，临行前，给赛珍珠夫妇打去一份辞别电报，但赛氏对此置之不理，从此两人情断义绝。赛珍珠尽管是对中国有很深感情的作家，但她是美国人，从小受到的是美式教育，林语堂则是讲究朋友之谊的中国人，对待金钱与朋友两者持有不同的方式和态度。林语堂在美国，他的畅销书都由沃尔什所在的出版公司出版。按照一般的美国做法，出一本书，出版社提10%的版税，可是沃尔什所在的出版公司对林语堂提50%的版税，且版权归出版社所有。从客观上讲，这对林语堂是不公平的。

但若仅因金钱问题而在两位著名作家之间产生无法弥补的裂痕，则未免将事情简单化了。据笔者考察，应该另有原因。

赛珍珠由于其特殊经历，对中国下层有深刻的体察和强烈的同情，她认为中国的农民以及普通大众饱受军阀、土匪和自然灾害之苦，政府应着力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而在南京的生活经历，使她看到了蒋介石政府腐败而且无能，蒋介石政府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他的政府与普通民众“如隔千山万

①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自序》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彼得·康著、刘海平等译：《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③ 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

④ 《林语堂文集》第8卷，第382页。

水”。^①赛珍珠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她同情共产党。林语堂在政治上的观点则与赛珍珠不同,他对蒋介石政府抱有信心,40年代林语堂离左翼越来越远,倾向于“亲蒋”。双方在政治上的分歧到了1948年产生了一个可怕的误会。1948年,林语堂完成新作《枕戈待旦》(Vigil of a Notion),他期望这本书与以前所有的著作那样受到赛氏夫妇的推荐,畅销,却受到了意外的冷落。原因是有传言何应钦付给林语堂2万美金,而林语堂认为这谣言是因赛珍珠、J. J. Singh、Agnes Smedley而起。^②政治观点的分歧往往是友谊破裂的主因,而在双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也可以探寻一些产生思想裂痕的因素。

赛珍珠在中国主要与中国的农民、妇女、佣人这几个层次有较深的接触,而与传统士大夫及新型的知识分子则缺乏深层交往。赛珍珠同情、热爱中国的普通大众,而对中国30、40年代的知识分子则缺乏全面的了解、把握。她根据对中国留美博士的印象创作的小说《同胞》讲述了一位反面的梁博士。梁博士在美国生活宽裕,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一个罩在东方色彩的中国,仿佛中国处于永久的和平之中。赛珍珠对脱离中国现实的某些华人的嘲讽,与国内左翼对林语堂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尽管赛珍珠本属无意。林语堂作为旅美作家,从文化介绍的角度,他早期的著作《生活的艺术》既是对中国士大夫赏花、品茗、

作诗等文化休闲的描绘,反映了一个安宁、充满文化氛围的中国,这与1936年的中国现实是相悖的,因而林语堂受到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赛珍珠的《同胞》尽管是对某些个别现象的真实描绘,但在身为受批评对象的林语堂看来,恐怕也是不太和谐和友好的表示。随着双方矛盾的加深,这个问题势必会成为友谊破裂的因素之一。

赛珍珠是中国长大的著名作家,一个使美国人们了解了中国普通大众的女作家,因写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尼克松总统曾赞誉她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林语堂是用英文写作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在西方拥有广大的读者,作品在西方有广泛的影响,曾因《京华烟云》等一系列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里根总统曾经提到自己了解中国很大程度归功于林语堂的创作。一个是“中国通”,一个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世界作家,两个人都为在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形象树立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赛珍珠与林语堂的友谊创造了文化佳话,也促使林语堂大批优秀作品的问世,而他们的友谊破裂则令人扼腕叹息,也令人深思。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责任编辑:周武)

① 彼得·康前引书,第303页。

② 《林语堂文集》第8卷,第380页。

欢迎订阅《史林》

《史林》(国内统一刊号:CN31-1105/K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7-1873)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高品位的历史学专业杂志,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一。它刊登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世界史及上海学研究等最新研究成果;开设海外史学名著评介、书评、读书札记等栏目。《史林》立意新颖,资料翔实,信息量大,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史林》以史学研究者、大专院校师生、中学历史教师、企事业单位和文史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请订阅并赐稿。

现开始办理2000年度订阅手续。2000年《史林》定价:每期10元,每年4期40元。本刊编辑部办理逾期补订和邮购。

请寄: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编辑部。邮政编码:200233。

·赛珍珠专题研究·

赛珍珠与中英小说比较研究

——评《东方、西方及其小说》

姚君伟

摘要 赛珍珠主要是一位作家，但她也称得上是一位作家型学者，至少是中国小说研究者。不过，赛珍珠的中国小说研究并非如多数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始于《中国小说》(1938)这一获奖演说。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她就有系列专论发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即其一。在这篇原也属演讲稿的文章中，赛珍珠从发展途径、结构和形式、意义和目的等方面，就中英小说之异作了初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本文在全面认识赛珍珠的中国小说观的基础上，对赛文观点作出详细的介绍，并对其局限性、其在当下语境中的价值进行客观的考察和分析。

关键词 赛珍珠 中英小说 比较研究 特点 局限 价值

一提起赛珍珠，人们就会想到她那明显带有中国文学风格的中国题材小说。这是对赛珍珠小说家层面的理解。其实，除开这一层面，赛珍珠还有其作为学者（虽然是作家型学者）的一面，而这一方面，至今似乎还没有引起中国赛珍珠研究界的足够的关注，已有的研究充其量还只是集中在《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上面；当然，这一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认识的产生倒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毕竟，在赛珍珠之前抑或之后，都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这样深具历史意义因而非常隆重的场合选择别国小说为题来演讲的。印象太深刻了，况且又是那样的赞美之辞：“……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这是赛珍珠出于个人对中国小说感激之情而作出的一番坦诚的表白。与此同时，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家具有启发意义”。⁽¹⁾在这篇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就中国小说侃侃而谈，涉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野叟曝言》、《镜花缘》、《金瓶梅》，等等。说她在这里提供的全然是一部中国小说简史，也许并非过甚其词。

“赛珍珠”，“1938年”，“中国小说”，三个“关键词”在这里联缀在一起，给人以某种独特的整体感，但也会起误导作用。我们切莫以为赛珍珠到了例行演讲时才就中国小说高谈阔论一番，更不能认为她对中国小说没有多年的研究积累而匆匆浏览几部中国小说史便草成

急就章，敷衍了事。客观地说，赛珍珠与中国小说的情缘可谓深矣。她长期浸淫于中国小说，时间起自其开蒙之时。后到成年，她在中国小说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在1938年之前就不断面世。请看以下几则材料：

1. 1930年2月，赛珍珠的《小说反映的中国》（“China in the Mirror of Her Fiction”）发表在《太平洋时事》（*Pacific Affairs*）2月号上，3月1日该文转载于《中国一周》（*The Week in China*）第8卷第257期第227~236页。

2. 1931年6月，她的《中国早期小说》（“The Early Chinese Novel”）发表在名刊《星期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7卷第46期上。

3. 1931年11月，赛珍珠的《东方、西方及其小说》（“East and West and the Novel”）在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通讯》（*Bulletin*）上发表。几个月后，她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同题演讲。

4. 1932年，赛珍珠将《中国早期小说》的文章略作修改，以《中国小说的早期来源》（“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Novel”）为题，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演讲。

5. 1932年8月20日，赛珍珠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第9卷第5期上发表《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Why...Should I Care?”）。

6. 1933年6月，赛珍珠在母校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论小说创作》（“On the Writing of Novels”）的演讲，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的《校友通讯》（*Alumnae Bulletin*），1933年夏季号。

7. 1933年6月，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以《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的译名分上下两卷由约翰·戴公司出版。

这里，不难看出，赛珍珠对于中国小说所怀有的兴趣、所表现出的热忱，而且，细读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章，我们感到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认识和研究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表现出认识上的承继性和连贯性特征。在关于中国小说的论述中，赛珍珠提出了许多她后来不断重申的、当然也不断完善的观点，发展到1938年，便有了《中国小说》的演讲，集其阅读与研究中国小说之大成，代表了她对中国小说的全部认识和理解。

不仅如此。由于赛珍珠自小就同时广泛阅读中英文小说（英文的尤其是英国小说，她特别喜爱狄更斯的作品），所以，在她的阅读中，不可避免地（尽管一开始也许是不自觉地）要作些比较意义上的欣赏。正因为她有着双重的文化视野，才促成了她日后的中英小说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应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自然结果。正如某比较文学家所说，比较文学是有了文学，才有比较，而非相反。在赛珍珠这里，情况是，有了对丰富的不同国别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小说的阅读经验，便有了她的比较小说研究。限于篇幅，本文讨论的中心主要不在于她阅读、宣传中国小说以及主动接受中国小说所施予的影响的情况，而力图集中评述赛珍珠以《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为题所写的中英小说比较研究的特点（包括比较的内容、比较中存在的局限等）以及她的这一比较研究在当下语境中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说，赛珍珠对中国小说既有对具体文本的阅读经验，又有史的了解。1933年11月28日，赛珍珠曾与来访的章伯雨说起她非常重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她将来愿意做一部《中国小说史》。⁽²⁾这话初听起来，似乎不无狂妄的意味。中国学者自己要做小说史，尚且不易，何况一美国人？但是，笔者校阅、细读了《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之后，感到她的这一想法也决非一时之冲动，应该说，她具备治中国小说史的素养，尽管果真做起

来,她还有大量的史料需要研读。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没能如愿见到这样一部出于饱读中国文学典籍、至少在文化上已经不能完全算外国人的外国人之手的《中国小说史》。有时,面对赛珍珠关于中国小说的系列论文和有关演讲,我们不禁揣摩,假使赛珍珠真的执笔撰写出一部《中国小说史》,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她撰出一本比较小说史(指采用比较的方法撰成),兴许也是可能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赛珍珠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论述,多少消除了一些缺憾。赛珍珠的这篇演讲名为《东方、西方及其小说》,实际上是中英小说比较,因为范围过大,为言而有物,以免大而无当,自须有所限定。中英小说之间可以比较的内容很多,赛珍珠并不希冀面面俱到,相反,她只是择其要者,作些提示性比较。

首先,她比较研究了中英小说不同的发展途径。她的这个切入点是颇有见地的。从小说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谈起,极有必要,因为中英小说是在各自的土壤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它们的内容还是艺术特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本民族种种文化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这是了解中英小说特征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然而,我们发现,西方的一些中国小说学者忘却考虑的正是这方面的差异,缺乏必要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装备,也就不能了解中国小说那特殊的局限性和独特的魅力。赛珍珠在两种文化背景里长大,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背景方面的深刻差异对于各自小说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赛珍珠客观而正确地指出,中国小说的起源大大早于英国小说,可发展则要缓慢得多,英国小说出现很迟,到了18世纪才羽毛丰满起来。我们知道,中国小说的形成以唐代传奇为标志,与中国小说相比,欧洲小说的诞生几乎要迟四五百年。欧洲小说在文艺复兴前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8世纪的英国文坛贡献给世界文学的是其“虽姗姗来迟,却迅速绽放,并立即为时人所注目,受到大众的喜爱,在文坛上占据主要地位的”⁽³⁾小说。赛珍珠特别指出,“英国文学从史诗、随笔到冒险故事,继而到小说,发展迅速,每一步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然而在中国,小说却长时间被排斥在文学大门之外。”确实如此,中国小说起步早却发展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人学士心目中所持的小说观。赛珍珠从小就清楚小说在中国根本没有地位,赛珍珠的家教孔先生精心指导她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经典,却向来反对她读小说。小说在中国算不上文学,《庄子·外物》里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修饰浅识小语以求高名,那和明达大智的距离就很远了。”⁽⁴⁾东汉桓谭认为小说不过是“合从残小语,近取譬论”的短文而已,⁽⁵⁾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定义一经刊布,立即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经典观念,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小说观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他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家可采,此亦乌莛狂夫之议也。⁽⁶⁾

道听途说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足观了。小说被孔子斥为“小道”,根本无法担当起“载道”的重任,《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十家”的排列顺序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在这个序列中,小说不仅叨陪末座,无甚可观,而且与“通万方之略”毫不相干。在这样的观念下面,“中国的小说家们总是害怕别人知道自己会堕落到去写小说的地步”。⁽⁷⁾所以,从前的中国小说家进行小说创作时,往往托古人,隐姓名,给后来的小说研究者添了不少乱,后者索引考证,叫苦不迭,有些小说(甚至是名著)的作者至今仍难以落实。⁽⁸⁾赛珍珠对小说家隐姓埋名以至身份不明的现象很是关切,说

是她心里一直思索的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事实上，在《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中，她专门谈过这个现象，对像《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的作者都不能判明感到有些困惑难解，但她也明白既然人们认为小说家们不配划归文学家之列，那么，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小说创作及其命运，就好理解了。为了让世人知道小说（家）在中国文坛上无地位这一历史现象和现实状况，赛珍珠饶有兴味地将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序整篇译成英语，该序结束时有一段话颇能表明中国小说家的心态：

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入，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⁹⁾

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中赛珍珠指出小说作品著作权人身份不详，原因就在于对小说的轻视。她比照说，“在西方，作者的名字和他写的书名一样重要，要研究此小说，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其作者，他的个性，他是否写出了他的时代特征，他本人要传达的思想，他的个人风格，等等，他和他的书是不可分割的。”关于作品的真实作者的问题，其实早已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一大课题，但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赛珍珠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胡适博士和鲁迅先生当时在这方面做的收集资料、整理研究的工作，只是她断言“目前还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因为供研究的原始材料如此支离破碎，”她担心有一些“只是猜测而已”。⁽¹⁰⁾不过，赛珍珠也发现，在中国，看重作品，而非某个作家，迄今为止一直是中国人阅读和研究的一个特性，她认为这是个“值得羡慕的特性”。⁽¹¹⁾

关于中英小说的发展，赛珍珠特别提到独创性问题。她认为，自小说诞生之日起，独创性在西方（当然包括英国）就是一件大加褒扬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小说家的素质，“一个作者不能泰然地盗用另一个作者的已为人知的情节或风格”，而在中国却并非这种情况，“最著名的小说都已在以前以很多形式出现过，……许多作者又会从这些小说中吸取素材，进一步发展成别的小说”，她举《金瓶梅》为例，并下结论说，“抄袭被看成是件光荣的事，而非丑事，独创性得不到鼓励。”赛珍珠这里的论断当然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下面还将涉及），但像作为中国章回小说的平话本身旨在讲述历史，评述历史人物的功过，在叙述上仍停留在史事和传奇的层面上，平话抄袭历史不仅顺理成章，更是势所必然。受说书人话本的影响，中国的章回小说在成书方式上也还有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当然也有独创型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但像赛珍珠本人喜欢又翻译的《水浒传》在成书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聚合联缀的步骤。西方的中国小说论者也时常指责中国小说的“抄袭”，殊不知，这里面有中国小说特定的发展的原因在。就中国小说家的“抄袭”手法而言，赛珍珠的论述并不尽然正确，像《金瓶梅》的作者也只是从《水浒传》中抽取片断情节，然后展开出去，对原作的发展是显然的，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赛珍珠循着中英小说发展途径不同这一思路，在第二部分对中英小说的结构与形式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她注意到，与中国小说相比，英国小说在结构上更具整体性，更注意整个故事情节的形式和衔接，而在中国小说中，“没有高潮也没有结局。常常连个主要的情景都没有，如果情景中还有那么一个人物或主要事件的话，只是一些发生在所谓的主要人物周围的事件。”她指出，这种小说的结构在西方评论家看来，“常常是拖沓冗长，毫不协调，有时是一团混乱”。然而，正是在小说的结构上，西方评论家眼里的缺憾，在赛珍珠看来却是优点，原因在于，这一结构里蕴含着与生活的极大相似，生活并无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的区

别，生活没有统一性，没有形式：

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变成怎样，不知道背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实际上，除了目前这短暂的瞬间，我们的存在，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我们与一些人相遇是因为在这短短的一刻，他们的时间与我们重合，他们一旦走出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再也不会遇见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的结局，当然，我们对自己的结局也并不心知肚明，一清二楚，这种支离破碎就是中国小说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一个个事件发生又结束，人们登上舞台，又退场，也许还会回来，也许不再相见。

赛珍珠认为，这样的小说结构（这确实也是结构）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情形；可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什么供作家自由驱使的文学技巧，它不啻是中国人认识周围生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法，一种哲学。针对人们可能要对这种结构的艺术性提出质疑，赛珍珠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我不知道艺术的定义，我也无法断定这是不是艺术，但我却很清楚，这就是生活，我相信小说中如果无法两者兼得的话，含有生活比含有艺术更好。”⁽¹²⁾赛珍珠在这里不仅仅就中英小说的结构和形式作比较，其比较中分明包含了自己鲜明的价值判断。她认为“我们西方人要知道故事的结局。这篇小说有了结局，用不着再多去想了”，中国人不一样，他们不轻易满足于这样或那样的结局，而愿意乐此不疲地推想下去。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习惯了中国小说观的口味，西方许多小说读起来对他来说，显然就像是吃一种易消化的食物一样”。也许，赛珍珠希望通过比较中英小说结构，说明无固定形式的小说，以及散漫的或者叫缀段性结构（episodic）倒更称得上是人生的写照，人生无所谓高潮，抑或结局，一部小说读过或者听完，理应帮助读者或听众更深入地了解生活，而非远远地逃离生活。⁽¹³⁾

赛珍珠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比较了中英小说中对素材的处理手法以及小说的创作宗旨。她使用人们所熟知的两个术语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表示小说家们所采用的两种主要的手法。她发现，英国小说有着明确的浪漫主义时期和现实主义时期，手法上的互相借鉴的例子是存在的，表现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写法的现实主义，也有借鉴现实主义手法的浪漫主义，但两种手法大体上相对独立，而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如《红楼梦》是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但更多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基调是浪漫主义的，她后来在《中国小说》中认为《红楼梦》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合为一体。她又结合她自己的阅读经验分析说，她所熟悉的中国小说，无论貌似多么的现实主义，几乎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很多完全就是浪漫主义。赛珍珠还提炼出中国小说中为表现浪漫主义的内容而采用的两大手法，即运用超自然现象和宣扬宿命意识。也许，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理论概念本身就具有兼容性，而作为手法，它们运用起来，也并非就具有多少绝对的排他性。

在这篇文章中，赛珍珠特别指出中国小说中故事的展开及众多角色的塑造，主要依靠的是小说家对于动作和对话的重视，很少有对于内心世界的描写。她的这一把握是准确的。后来，赛珍珠在《中国小说》中，对中国小说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有更多的分析和阐述，她发现，人物描绘的生动逼真，是中国人对小说质量的第一要求，但这种描绘是由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实现的，决非靠作者出面来解释。⁽¹⁴⁾确实，借助于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描写人物性格，在动态中塑造人物形象，采用质朴而纯厚的白描表现手法，是优秀的中国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如《水浒传》中为了写武松的勇猛就通过他打猛虎的动作性情节来呈现，作者没有站到前面来讲述，这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没有人物行动，就失去了说话艺术的精髓，

也失去了中国小说的精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行动性正是中国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集中表现。”⁽¹⁵⁾至于心理描写，在中国小说里，人物的内心世界已经外化为行动、语言等种种形态；换言之，中国小说里也不是没有心理描写，只是采用更蕴藉、更含蓄的方式罢了。

《东方、西方及其小说》篇幅不算长，内容却十分丰富。由于原先是一篇演讲稿，有时间限制，便只能说就中英/中西小说的一些相异之处给个“扼要”。但是，她终究还是大致成功地展现了中英小说的过去、现状，同时，她对中国小说的未来也作了乐观的预见。

毋庸讳言，赛珍珠的中英小说比较研究是有其偏颇之处的。已有学者在评价《中国小说》的时候提到她对中国小说史的描述有欠准确的地方（惜未能明示）。就《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中的一些观点而言，笔者认为有几点是可以提出来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演讲稿发表于60多年前，从20世纪30年代到2000年的今天，中英小说的比较研究成果累累！我们以后来者的优势指出其偏颇乃至偏见之处，决无否定全文的意图，正相反，在本文最后的篇幅里，我们还拟就此演讲稿在当下语境中的价值作一个人的评价。

中英小说汗牛充栋，就此提出的任何一个结论都可能会具有以偏概全的缺陷。早在1937年，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过：“……中国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着重号为笔者所加）⁽¹⁶⁾这一提醒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必须真正对比较对象所在的文化取得透彻的了解，作出深入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也许才会令人信服，否则，理由不充分，“固有”遂成“特有”或“独有”。就赛珍珠《东方、西方及其小说》而言，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一、中国小说的独创/抄袭问题

赛珍珠在文章中谈到，在中国，“最著名的小说都已在以前以很多形式出现过，现在我们采取的形式只不过是最后或最好的一种。许多作者又会从这些小说中吸收素材，进一步发展成别的小说，比如《金瓶梅》，讲的就是《水浒传》中较有名的片断之一，抄袭被看成是件光荣的事，而非丑事，独创性得不到鼓励。”其实，除开赛珍珠，西方还有不少评论家作出这一指责，认为中国小说过多地依赖原始材料，因而缺乏独创性。典型的例子就是赛珍珠提出的《金瓶梅》。其实，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依赖原始材料虽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它已获得了最终的形式。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众多的原始材料被采用了。毫无疑问，利用早期的作品作创作素材是中国白话小说创作非常普遍的手段。可是，很少有西方的批评家认识到，这种原始材料在《金瓶梅》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¹⁷⁾著名的《金瓶梅》研究专家帕特里克·韩南（Patrick D. Hanan）指出，这些原始材料只占作者用来写其小说的文学背景的很小部分。《金瓶梅》与任何在它之前写作并留存下来的小说相比，不是更多在依赖它的原始材料，而是对故事叙述得更紧凑。⁽¹⁸⁾准确地说，中国小说家的独创性已经寓于其“抄袭”之中，他们在“抄袭”中求发展，他们的这一文学创作行为带来的成功的作品已经超越了其所借鉴的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英国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佳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尽管文类上不能划归在小说里面。赛珍珠本人后来在《中国小说》的演讲里提到中国历史早期有许多小说的原始资料，“这类书如果让莎士比亚去读，他很可能会全力把里面的卵石取出让它们变成珠宝。”为什么中国小说家不能这样做呢？

二、中国小说的说教问题

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中，赛珍珠谈到“如果是处在一个注重道德的清教徒时代，